阅读圆润了我的梦

钟兆云

从前的人囊萤映雪、凿壁偷光,或者秉烛夜读,三更灯火五更鸡,皓首穷经,寤寐思之,在书与书之间穿梭,在字里行间钩沉——那是多情且隽永的事,像是打通古老神秘的时光甬道,把荡漾在里面的遥远故事如春风般节节漫进心思,把细碎的时间连绵成厚实的岁月,把单纯的阅读连缀为对生命的珍惜和敬畏,可见恢宏浩大的骨力、波澜壮阔的追梦。古人就是如此可爱,盎然地把执着写进书香和历史,不敷衍不计较,一生天然爱好地与笔墨纸砚打交道。他们兴许知晓,人的身躯无论用什么绫罗绸缎装饰打扮,都不如一系列知识文化布在身上来得风姿绰约。一言以蔽之,"腹有诗书气自华"。纵使最终落得一场空,铁铮铮而不能立功扬名于天地,"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

岁月沉沉浮浮,人心也变得起起落落。越往后,人就越多些许复杂,在风云流转的世间走一遭犹如逛大观园,或者本身已把自己修炼为一个大观园,在各种事物上纵横无羁,海阔天空,眉飞色舞地亲密接触着社会,解甲归田般地疏远了书卷。浑不吝的阅读态度、青黄不接的阅读质地,总要使一个浓妆艳抹的人掉色、凋谢、枯萎,最终是"红颜暗老白发新",粗率、早衰、悲愁、哀叹。各人住在各人的传奇里,在浮躁气息里面临着种种不测风雨。

书的价值在读,不去读就相当于废品。当下倒是有一种司空见惯的现象,人们喜欢摆弄把玩它们,美其名曰珍藏。看着漂亮书架上琳琅满目的书籍卷帙,多少填补了肚里无墨的心理落差,也能自娱自乐、自我满足。有客人来,顺带参观一番,客人"啧"声不断,出门了还带上喇叭,可圈可点地广而告之,让叶公好龙者不费吹灰之力便赚了个名声在外。书又不傻,早已把人类的这等浅薄记在眼里。到最后人愈发地两鬓斑白了,书还葆着朝气蓬勃的"小鲜肉"状,与环境和主人形成巨大反差。万物有灵,书籍亦然,要求人对之有所尊重与理解。越是装点门面,越是物极必反。最后,人寂寞了,书也寂寞了。早从它们进入书架里的那一刻,已注定被埋入了坟墓,横生凄凉。归根结底,还是人类虐待了文化。

历史一路传承下来的美好风气荒芜成这样,叫人看了无奈且无力,有严重的疏离感,仿佛看着那一寸寸斜阳暮光被月亮给慢慢兜住了,成了灰,成了尘埃,成了追忆,再也回不来了,不免心疼。时代兴许也同情现代人这般可哀的境地,各地遂不约而同地有了读书班、读书周、读书月甚至读书节这类文化"盛宴",为浮躁的人心与微纤的阅读搭起一座桥梁,让它们产生某种神奇的关联。此宴非彼宴,从无到有,让人多少有些"落花流水春去也""似曾相识燕归来"的感觉,重拾了往日的浪漫。虽不是什么至伟奇功,却也隐约见着几分含蓄的豪迈,彰显着文化的余威仍在。

我所在的福州,是一座有着两千多年历史的历史名城、文化古都,横看贞静婉约,竖瞧简洁素朴,在历史的潮汐中不温不火,谦卑低调。但这谦卑的尽头有着数千年的文化底蕴,绵长的史脉没理由间断,知者有责任去延续曾经的文化,为政者不可怠慢地亦需要积累更多的底蕴丰沛自身,润泽百姓。福州的读书月,定于每年的9月28日孔子诞辰纪念日至10月28日,肇始于2006年,迄来不觉已十余载。

形形色色的读书活动不一而论,其选择大抵有"惜取"之意味。对阅读怀抱热情的人,别说一班、一周、一月,就是押上一生犹觉不够。但东西不在多,在于精,不在长,在于实。譬如观赏宋画《寒江独钓图》,取意"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冷寂的画面仅有一水一舟一翁,足够的留白托着一个"独",灵动有生机,雅化的同时又添了几分渺远的意境。可见点到为止和知足的重要性。套在读书中,也同理。一年到头能手不释卷自是雅事,却也没几个人做到,从中抽取一段特定时间做加强或升级版,带动社会的阅读氛围并互为影响,美妙在于与其说是一种形式,更是一种分量,而且有针对性、留白够多,要是接二连三,反而画蛇添足,驳杂得令人厌倦,不当回事儿更没那意思了。

真正的读书人,是不受这类时空限制的。"读"有许多字面意思,有一种说法是从言卖声,诵书也,强调籀书,籀各本作诵。这已属于艺事了,过于高雅。如果一个人能守望到这种程度,那迎面喷薄而出的应有几分超凡脱俗之气。放在当下,委实有点要求过甚,除了一心一意的老学究,世俗百姓哪有闲情逸致去凑这类风雅,早已逃之夭夭,荡漾在时代的春风里了。

另有一种说法便是普通的阅读,读了即可,不过分要求深浅。这是普罗大众基本可以接受的程度,正所谓"好读书,不求甚解"。我花时间静下心来读书,领悟多少便汲取多少养分,以此循序渐进,在潜移默化中培育个人涵养、才气、情怀,在自然而然中走向更深邃的境界。这是潇洒的精神享受,更符合现代大众的生活节奏与口味。人们愿意接纳能让自己赏心悦目的阅读,所以在各地大小规模不等的读书活动里,与阅读相关的专场活动轮番登台。但不管是何种形式,只有真的"读",才具有顽强的生命力。所有的读书活动都只集中在一时一地,唯有让影响意犹未尽。全民阅读的热潮是否已经到来姑且不论,只要引领得法,多少使人感受到些文化的滋润与文明的熨帖,是大可"飞入寻常百姓家"的。

古人说,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在现代化的今天,也许应该是行万里路不如读万卷书。阅读能使一个人光彩溢目,阅读能使一座城更显雍容典雅、活色生香。这也是十多年来,我工作和生活的闽都新添的一条爱上阅读的说法。每届读书月都会评选和奖励"书香人家"和"读书明星",不论学历年龄、身份地位、名气背景,都可参与,众生平等。这让人们重新发现了"读"的好处。记得黑格尔曾经很可爱地谈到,一个人不能脱离他所处的那个环境,就如同不能脱离自己的皮肤一样。一种现象的出现向来是照应着时代的需求,不可能莫名其妙地冒出。若把这类评选放于古代那种"世上唯有读书高"、追求"黄金屋"和"颜如玉"的环境中,大可不必;但对今日碎片化阅读甚嚣尘上的社会,倒颇有些好处,明星榜样多了,传播效应也就大了。多读书、多学习文化还能得到鼓励、赢得喝彩,何乐而不为?于时代、于民众来说,有益无损。古人有知,兴许会感叹今人的悲哀,但今人不做,就更悲哀。

未来该怎么阅读,我不甚清楚,却知道,阅读其实不需要理由,任何时候阅读都不迟。阅读带给我思考思辨,圆润了我的梦,点缀和活泼了我的人生。

梅兰芳戏迷轶事

孙玉蓉

梅兰芳(1894—1961)先生,字畹华,江苏泰州人,京剧、昆曲表演艺术家。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博士生导师、原梅兰芳纪念馆馆长秦华生先生评价:"梅兰芳大师一生从事京昆表演艺术,努力继承,大胆探索,善于革新,从所装扮的人物个性出发,运用唱念做舞的艺术表现手段,把众多的古装戏和时装戏中女性形象刻画得细致入微,生动传神,为中国戏曲人物画廊增添了一系列光彩照人的女性形象。他精彩的表演、迷人的风韵、独特的韵味,构成杰出的梅派艺术,成为中国戏曲艺术宝库中一颗晶莹璀璨的明珠,熠熠闪耀。"而一百多年前,北洋大学毕业生、戏迷俞泽箴(1875—1926),却对青年梅兰芳的表演艺术,有着独家评说。

俞泽箴是俞樾的侄孙、红学家俞平伯的堂叔。他在北京工作期间,有幸多次观赏梅兰芳的演出,并在日记中留下了观感。

1920年10月31日,星期天的午后,在崇文门外三里河识云公所,俞泽箴观看了为吴松云先生祝寿而举办的堂会。"观剧得见俞华庭、徐碧云之《乾元山》,五龄童之《空城计》,俞步兰之《千金一笑》,小振庭、小小楼之《铁笼山》,小桂花之《打花鼓》","小桂花、苏斌泰之《小放牛》,福芝芳之《梅龙镇》,杨小楼、钱金福等之《连环套》,程艳秋之《学堂》,姚玉芙之《彩楼配》,王凤卿、裘桂仙之《中牟县》,龚云甫之《徐母骂曹》,陈德霖之《宇宙锋》,侯俊山、崔灵芝、孙佩亭之《连环计》"等。在这次堂会中,他观赏到了梅兰芳与王蕙芳合演的京剧《樊江关》,梅兰芳饰演薛金莲,剧中薛仁贵之女。王蕙芳饰演樊梨花。同时观赏了梅兰芳、姜妙香、徐兰生、李寿山合演的昆曲剧目《玉簪记》。他认为"以《乾元山》《打花鼓》《樊江关》《小放牛》《连环套》《学堂》《中牟县》《徐母骂曹》《宇宙锋》《连环计》为最佳。梅大王之昆曲究不若其皮黄,而姜妙香尤非其选,转不若侯、陈、崔、龚等老伶工之尚存先正典型也"。这是一百年前戏迷的评价,见于先贤的日记手稿中,见仁见智,均可理解。朱家溍先生曾说,京剧演员有本领的都自己要求以昆乱不挡为标准,科班戏要以昆腔打基础。而梅大师偏偏"是由皮黄青衣入手,然后陆续学会了昆曲里的正旦、闺门旦、贴旦"(梅兰芳语)的。这样看来,俞泽箴当时认为"梅大王之昆曲究不若其皮黄"的评价,还是独具慧眼的,印证了梅派艺术也是逐渐成熟、完善,达到艺术最高境界的。

事隔三年后,在郭则澐、俞珊夫妇假座钱粮胡同聚寿堂举办的堂会演出中,俞泽箴再次观看了梅兰芳、李寿山、姜妙香、徐兰生原班人马演出的《玉簪记》之《问病》《偷诗》,这次观剧除了客观记录,没有留下评论,也没有与当日演出的众多名家进行比较,可以想见,这一次的演出已经取得了显著进步。

1920年11月13日晚,郭则澐夫人俞珊在北京前门外的第一舞台,即最早建立的舞台式剧场,请娘家长辈亲戚观剧,堂叔俞泽箴记下了当晚所观剧名,"为朱幼芬之《泗州城》,武艺绝佳,次为谭小培、黄润卿之《南天门》,王凤卿之《昭关》,陈德霖、王又宸、裘桂仙之《二进宫》",压轴是梅兰芳、李敬山、姚玉芙、姜妙香合演之《二本虹霓关》,压大轴是杨小楼的《恶虎村》。

1921年1月22日晚,俞泽箴与庞敦敏、冯织文夫妇等五位南方老友至新明大剧院观剧。庞敦敏是细菌学家,冯织文是早期的妇产科医生,他们又是著名语言学家赵元任的表兄、表姊。那一晚,除了观赏"李小山之《浣纱记》,王蕙芳、朱素云之《胭脂虎》,龚云甫之《三进士》……王蕙芳、王凤卿、龚云甫之《回笼鸽》"外,还观赏了梅兰芳的昆曲《思凡》,以及梅兰芳、王凤卿合演的京剧《打渔杀家》。自1919年,梅兰芳就与余叔岩合作,演出《打渔杀家》。后来,又相继与王少亭、周信芳、马连良合演过此剧。而与王凤卿合演《打渔杀家》,尚属比较少见的合作。

1923年2月11日,又是星期天,晚饭后,俞泽箴与堂弟等人再次往第一舞台观剧,观赏程艳秋、陈德霖、龚云甫、王又宸之《四郎探母》,梅兰芳、杨小楼、王凤卿之《霸王别姬》等,居然看到夜半四时许方才返回寓所。《霸王别姬》是梅派最具代表性的名剧之一,1922年2月15日,他们在北京第一舞台首次演出该剧,梅兰芳饰演虞姬,杨小楼饰演楚霸王项羽,王凤卿饰演韩信。一年后,俞泽箴等终于观赏到了这部剧目。俞氏兄弟居住在北京,真是近水楼台,得天独厚。

1923年8月24日,俞泽箴应堂侄俞平伯约请,同到新建的真光剧场观剧,主要有"朱桂芳之《蟠桃会》,诸茹香、程继先之《马上缘》,郝寿臣之《青风寨》,王凤卿之《取成都》",压轴则为梅兰芳的昆曲剧目《金雀记》。

在1920年、1921年和1923年这三年间,俞泽箴与亲友或者独自在吉祥、三庆、同乐、庆乐、广和楼、新明大剧院、真光剧场、第一舞台、聚寿堂等处共计观剧、听戏18次,其中多次夜半三四点钟方归。可以说大饱眼福,过足了戏瘾。1924年3月3日晚,俞泽箴还到奉天会馆观看肄雅社昆曲彩排,"返西城寓庐已二时矣",雅兴不减。

1924年6月30日上午,俞泽箴与堂弟等人在前门看到了梅兰芳之母出殡的场景,"仪仗绝盛,畹华居幄,次有军士四人持枪护随"(日记语)。这种场面让他觉得有点过分,心理上难以接受。或许因为他出身于官宦之家,思想上烙有较深的等级观念。他在日记中写道:"一伶人耳,而猖獗若是,狐鼠跳梁,可胜浩叹。"此后,直至他辞世的两年中,他竟彻底戒除了观剧的爱好,在日记中再未留下相关的记载。

中国家谱史的京津冀样本

罗艳春

在开创了于方志中特表士族传统的乾隆《永清县志》中,尽管依据正史、家传、墓志、选举册等史料整理出23支士族的世系,但面对大多数家族谱牒荒略难考的现状,章学诚仍然不禁感慨道,"大河以北,风俗简朴""谱牒之学,缺焉不备"(《永清县志·士族表》序例)。类似的局面,无论是吴汝纶编撰《深州风土记》的同治光绪年间,还是许同莘撰写《河朔氏族谱略》的20世纪30年代,均未有显著的改观。随着家谱的学术价值日益受到重视,各种目录、资料选编等文献相继整理出版,北方家谱的概貌也逐渐明晰。日本学者多贺秋五郎在《中国宗谱研究》(1981年)中,列举了日本公藏机构的清代河北族谱目录31部。在《中国家谱综合目录》(1997年)及《中国家谱总目》(2008年)等书中,所统计的公藏河北省家谱目录信息则更为丰富。冯尔康先生主编的《清代宗族史料选辑》(2014年),从近40种清代直隶地区族谱中辑录了大量文字资料与图像资料,北方家谱缺焉不备的传统印象因之也大为改观。北京燕山出版社最新出版的由孙爱霞、任吉东主编之《京津冀家谱》,选取了清代、民国时期京畿家谱40余种予以影印,对中国家谱的历史研究而言,不失为一次京津冀样本的集中展示。

《京津冀家谱》首先体现出的一个显著特征,是移民家族修谱的普遍性以及土著家族谱牒的相对稀缺。以几世能文、一门风雅的文学世家任丘边氏为例,其所能追溯的最早有明确生卒信息的祖先,是"明永乐初从军,以功授昭信校尉,世袭百户,赐田三百亩"的三世祖边复初,可见即便是声称世居的望族,其家族发展的关键性时刻其实还是与明初北方地区的宏观整体历史脉络息息相关的。同理,我们在移民家族的谱牒中也能看到大量明初永乐年间迁入定居的祖先故事,其中既有广为人知的山西洪洞移民,也有同因明初"迁大姓实畿辅"政策而来的山东登州、莱州、沂州等地移民,另外还有一批随明成祖北上征战的浙江山阴、余姚等地移民。与明初的军事性移民不同,明末清初则多为因宦、因商而移民者,且大多集中在京津一带。正如民国时期许同莘所言,"北方各县,自永乐以后,民皆土断,迁徙者渐少,唯大、宛两县为辇毂所在,京朝官著籍于此者,无省无之……天津盐商,亦多南方人。乾隆间,水西庄查氏煊赫一时。严范孙先生之先,亦浙人而业鹺,遂籍天津,此其尤著者也"(《河朔氏族谱略》)。

《京津冀家谱》的另一个显著特征,则是其所影印的家谱大部分均刻印版行于清光绪至民国时期。晚清近代北方家谱编修的日趋繁荣,一方面与政、学、军、商等各界新旧精英群体的积极参与有关,也反映了近代社会思潮对于谱牒编修的影响。身为吴汝纶的弟子,武强贺涛对于徐世昌在致力于推动新政的同时,"汲汲然以纂辑世德为急务"予以高度赞扬,认为"非施于家与施于国者异也,将变所趋,必定所守"(《书天津徐氏族谱后》)。其子贺葆真在为《文安王氏宗谱》撰写谱序时,不仅延续贺涛之主张,坚持"欲维世道,固其国而奠其基,必自保族始",而且以"戚姻及诸朋好凡累世读书者曷尝无谱"的亲历亲闻,再次反驳了"大河南北士大夫之家多无族谱"的旧说。徐世昌、贺涛、贺葆真等人的实践与文章表明,桐城派对于近代北方社会的影响,不仅在于学术与政治层面,社会层面也是值得继续深究的议题之一。

中国社会史学会会长、南开大学历史学院常建华教授指出,对中国族谱资料的整理,在编目、提要、选编、影印、考释等方面已经取得了可观的成绩,但是还不太完善,需要继续努力。《京津冀家谱》的出版,无论在空间还是时间维度方面,都为当前学术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家谱样本参考。

寒山积雪(中国画) 郑二岭

大师只说家常话

陈鲁民

拾柴篇

古今中外的各路大师们,虽学问高,本事大,才华横溢,满腹经纶,但却大都不爱显摆,哗众取宠,亦不去故弄玄虚,引经据典。他们多喜说家常话,爱吃家常饭,倾心于过家常日子,做家常人。

恺撒乃军事大师,打仗奇才,文笔也是一绝,他写的《高卢战记》,叙事翔实家常,文笔清晰简朴,是世界名著。公元前47年,恺撒率大军经过一番激战,平定了帕尔纳凯斯的叛乱。大获全胜后用家常话给罗马元老院报捷:"我来了,我见了,我胜了。"成为史上最简短也最著名的捷报。

赵州和尚是佛学大师,造诣厚重,被誉为学问僧,但却一向以家常话讲经开悟。《五灯会元》记,赵州和尚问一僧:"曾到此间么?"曰:"曾到。"师曰:"吃茶去。"又问一僧,僧曰:"不曾到。"师曰:"吃茶去。"后院主不解:"这是为何?"师曰:"吃茶去。"赵州和尚连说三个"吃茶去",暗藏机锋,深含禅意,听得懂说明你有佛缘,留下细谈,听不懂那就吃茶走人,各忙各事。

诗歌大师白居易,人称"诗魔"。他崇尚的诗风就是说家常话,明白务实。据说,他每次诗成之后,总是先念给老妇们听,若听不懂,就拿回来修改,直到她们能听懂为止。"老妪能解,妇孺皆知",即是对他的高度评价,史上独一无二。《长恨歌》之所以比《春江花月夜》影响要大得多,就得益于通俗易懂,明白如话。

鲁迅是文学大师,学富五车,著作等身,能写漂亮典雅的文言文,但他在遗嘱中却句句都是家常话:不要做任何关于纪念的事情;赶快收殓,埋掉,拉倒;别人应许给你的事物,不可当真;不得因为丧事,收受任何人的一文钱,但老朋友的,不在此例;孩子长大,倘无才能,可寻点小事情过活,万不可去做空头文学家或美术家……

白话文大师胡适,曾留学多年,学贯中西,有几十个博士头衔,但他却从不故作高深,而是喜欢用国人都能听得懂的家常话来交流。他的演讲明明白白,观众都能听懂;他的著作清清爽爽,读者皆可理解。无怪乎那么多人喜欢炫耀说"我的朋友胡适之"。

钱钟书是学问大师,精通国学也熟悉西学,他固有高深莫测的《管锥编》面世,但更喜欢用家常话与人交流。他把婚姻说成"围城",可谓一语中的,入木三分;为拒绝采访,说"你觉得鸡蛋好也不必见下蛋的鸡";不想去参加应酬,就说那是"不三不四的人,吃不明不白的饭",辛辣而形象,幽默而接地气,令人忍俊不禁。

大师爱说家常话,是因为他们深谙此理:首先,让人听懂是说话的最高境界,因而怎么清楚怎么说,怎么明白怎么讲。其次,他们的水平与学问已经得到证实,无须再用大话、套话、故作高深的话来唬人。再次,他们明白,真理是朴实、简明、直通人心的,不必要那么花哨的语言、繁琐的术语,绕那么多圈子,只要有话好好说就行了。

家常饭菜养人胃肠,吃得饱,吃得香;家常话语受人欢迎,记得住,传得开。有鉴于此,有些人在云山雾罩、卖弄文采时,务请记住一句话:大师只说家常话。

古籍中的津沽园林(九)

佟楼原是枣香村

章用秀

今津河以南、马场道西面,清代康熙、雍正年间有位叫童葵园的文人就住在这里。那时这一带还是一片田野,只有童氏一家,童葵园买田数亩,建起一座私家园林,名"枣香村",也叫"南庄",久而久之竟讹传为"佟楼"。

童葵园,字兰凤,天津人,居直沽南,以"闲闲"署其斋,与津门著名学者龙震同以工诗著称,著有《闲闲集》。其生平被清代陶梁辑《国朝畿辅诗传》、徐世昌撰《大清畿辅书征》、梅成栋辑《津门诗钞》等多部典籍载入。

沽上丛话

童葵园心志淡泊,不求闻达,其性情颇似晋人陶渊明。他有一首《闲居》诗,曰:"闲居忘语默,寡怀游所天。箕倨憩竹阴,夕阳辉櫚前。飞鸟过庭树,暮云交荒烟。万类俱变态,忘形适自然。云胡役尘事,方寸百虑牵。窒欲无骄侈,富贵何用焉。淡泊以明志,箪瓢等肥鲜。安居以乐道,容器似华椽。诗史娱岁月,涉猎胜田园。勿为情所肆,养性得其全。"他逝世后,许多津门文化人都对他和他的枣香村追念不已。

《续天津县志》卷十九《艺文》收有童葵园《沽上饯别》诗:"海天新涨一杭浮,野树鸣蝉夹岸稠。村落几家云树下,夕阳一片柳梢头。碧筒鲸吸酬吟兴,紫管鸾吹送客愁。脉脉离情何处是?半滩红染蓼花秋。"此诗是讲送友人的,本是抒写离愁别绪的,从中可见童葵园与诗友间的深情与交往,却也生动记录了三百年前枣香村一带柳细蝉鸣的水乡野趣。

枣香村,人们依其姓称之为"童楼",无独有偶,在天津城西邵公庄南运河畔有一位叫佟鋐的人,其楼称"佟家楼"。不可思议的是,真正属于佟家的楼如今非但早已不见踪影,连名字都被人淡忘了;而"童楼"却成了"佟楼",而且作为地名居然以讹传讹地一直被使用,叫得是那么响亮,这在天津真是一件有趣的事。

满庭芳

第五一一九期